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人文与社会译丛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

Isaiah Berlin

[英国]伯林 著 冯克利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

Isaiah Berlin

[英国]伯林 著 冯克利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 / (英) 伯林 (Berlin, I.) 著; 冯克利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0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SBN 7-80657-435-2

I. 反... II. ①伯... ②冯... III. 思想家-研究-世界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271 号

Copyright Isaiah Berlin 1995

© Isaiah Berlin 1959,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9

'A Bibliography of Isaiah Berlin' © Henry Hardy 1975, 1979

This 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 © Henry Hardy 1979

Introduction © Roger Hausser 1979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2000-048 号

书 名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

作 者 [英] 伯林

译 者 冯克利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Pimlico,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插 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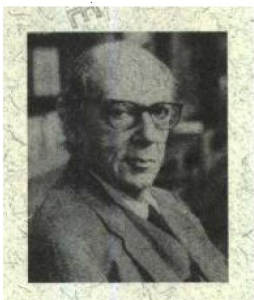
字 数 385 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35-2/I·339

定 价 26.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汀等参与了普通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在本书所收录的杰出论文中，伯林讨论了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哈曼、赫尔岑和索雷尔等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异见者”。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战着传统的智慧，但他们的贡献却远远不为人们所认知。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创造力量，生动地揭示出这些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创见，并以此来捍卫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作者弁言

对于这些讨论观念史的文章,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不过,对于我在这些文章所论及的题目上所持的观点,罗杰·豪舍尔(Roger Hausheer)提供了满怀同情而又清晰的说明。如果不借此机会向他致谢,未免失敬。一个作者不可能寄望于批评家有更多的理解、细心和彬彬有礼了。我要向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以赛亚·伯林
1978年9月

编者的话

本书是我把以赛亚·伯林已发表的大部分文章编辑成册加以再版的五本文集之一,这些文章过去都没有结集出版过。^①他的许多作品散见于各处,经常是发表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而且大部分都已绝版。只有六篇文章曾结集再版。^②这五本文集,再加上收在本书中的一份他的全部已出版作品的目录,以及我后来出版的各卷(其中许多都是未刊稿)^③,使他的全部作品比过去更易于得到人们的了解。

① 本卷 1979 年初版于伦敦,1980 年在纽约出版。其他各卷是: *Russian Thinkers* (《俄国思想家》),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我与 Aileen Kelly 合编;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概念与范畴: 哲学论文集》), London, 1978; New York, 1979; *Personal Impressions* (《个人印象》), London, 1980; New York, 1981;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人性的曲木: 观念史文集》), London, 1990; New York, 1991。还有一本这些书的选集: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细究人性: 文选》), ed. 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 London, 1997; New York, 1999。

② *Four Essays on Liberty* (《自由四论》), London and New York, 1969; 和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维柯与赫尔德: 观念史研究两篇》),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其他集子只有译本。

③ *The Magus of North: J. G. Ha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rationalism* (《北方的魔术师: 哈曼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起源》), London, 1993; New York, 1994;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现实感: 对观念及其历史的研究》), London, 1996; New York, 1997。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全是论述观念史的。出于不同的理由，我删去了九篇本来应收在本书中的属于同一领域的文章。其中有：《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和《穆勒与人生的目的》，它们已经重新发表在《自由四论》中；《维柯的哲学观念》和《赫尔德与启蒙运动》修订后单独成书，即《维柯与赫尔德》；《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现已收入《现实感》；《西方乌托邦观念的衰落》、《欧洲统一的潮涨潮落》、《浪漫主义的意志崇拜：对一个理想世界的反叛》和《曲木：关于民族主义的一则笔记》收入《人性的曲木：观念史文集》（实际它是本书的姊妹篇）；以及本书初版之后发现的三篇文章，和过去未发表过的一篇论约瑟夫·德·迈斯特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可以在本书后面的编目中找到。

本卷文章最初发表的具体情况如下。《反启蒙运动》原刊于《观念史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1968—73: Scribner's），《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见于迈龙·吉尔莫尔所编《马基雅维利研究》（Myron P. Gilmore, ed., *Studies on Machiavelli*, Florence, 1972: Sansoni）；《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是“泰克西纳纪念讲座”的讲稿，由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维柯的知识观》原题为《评维柯的知识观》，原刊于塔哥里亚索佐和怀特编《维柯：国际会议录》（Giorgio Tagliacozzo and Hayden V. White, ed., *Ciambattista Vico: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Baltimore, 1969: John Hopkins Press）；《维柯和启蒙运动的理想》原发表在《社会研究》第43卷（*Social Research* 43, 1976）；《孟德斯鸠》见于《不列颠学会公报》第41辑（*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 41, 1955）；《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是为莫里斯所编的《大卫·休谟：二百周年纪念文集》（G. P. Morice, ed., *David Hume: Bicentennial Papers*, Edinburgh, 1977: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所写的专稿；

《赫尔岑和他的回忆录》是为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Alexander 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 trans. By Constance Garnett, London, 1968: Chatto and Windus; New York, 1968: Knopf) 所写的序言;《赫斯的生平与观点》是“沃尔夫纪念讲座”的讲稿 (Lucien Wolf Memorial Lecture, Cambridge, 1959: Heffer, for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原刊于《英国犹太人历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 22, 1968—9, London, 1970: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威尔第的“素朴”》发表在《威尔第研究国际会议录》(*Atti del 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verdiani*, 1966, Parma, 1969: Istituto di Studi Verdiani);《乔治·索雷尔》最早刊于1971年12月31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后经扩充收入阿伯拉姆斯基所编《卡尔纪念文集》(Chimen Abramsky, ed., *Essays in Honour of E. H. Carr*, London, 1974: Macmillan);《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发表于《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 46, 1979)。在此我要感谢各出版机构允许我重印这些文章。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过一些人的慷慨协助。罗杰·豪舍尔不但写了序言,并且提供了德语资料方面的帮助,尤其是有关哈曼和赫斯的两篇。David Robey 帮助编辑了马基雅维利, Edward Larrissy 帮助编辑了布莱克,已故的 Robert Shackleton 帮助编辑了孟德斯鸠, Robert Wokler 帮助编辑了卢梭, Barry Stroud 帮助编辑了休谟, Aileen Kelly 帮助编辑了赫尔岑, Lord Blake 和 Vernon Bogdanor 帮助编辑了狄斯累利, Terrell Carver 帮助编辑了马克思, Jeremy Jennings 帮助编辑了索雷尔。没有这些学者的协助,我是完不成这项工作的,因此我将对他们铭记不忘。以赛亚·伯林以始终不变的谦和态度,回答着我不停的询

问,他的秘书 Pat Utechin 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和支持。最后,我还要感谢 Keith Thomas 爵士,他指出了原稿中的一些错讹之处。

xi

亨利·哈代

1997 年 6 月于牛津沃尔夫森学院

序 言

罗杰·豪舍尔

有两种狂妄表现：排斥理性，或只承认理性。

帕斯卡尔

假如头脑清楚的人以为凡是混乱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任务是，当遇到这种事情时，他要拨开迷雾，勾勒出朦胧之中模糊难辨的轮廓。

约翰·S. 穆勒

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

C. 赖特·米尔斯

—

以赛亚·伯林讨论观念史的文章，并不是根据某种观点写成的。他不打算用它们直接去澄清或支持（或攻击和破坏）任何一种历史或政治学说。它们涉及的范围包括像马克思、狄斯累利

和索雷尔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人物,以及一些相距甚远的题目,如民族主义和知识理论。它们完全是探索性的和非教条的,不是给定答案,而是提出一些初步的、常常有着深刻的悬而未决性质的问题。伯林和任何思想家相比,大概更不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简单的真理,然后用它来解释和改造这个世界。但他的文
xiii 章既非漫无目的随风倒的产物,亦不是一些应时之作,相互没有关联,只在最初发表时才有意义。因为它们全都来自一个核心观点,一个歧路丛生而又复杂、从而无法达到完美的观点,它涉及人类及其各种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它们在许多隐蔽的和出人预料的层面,微妙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伯林一再根据某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提出并阐述他在哲学文章中较抽象地讨论过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处在他对观念的毕生关切的中心,它们本身也有着重大的内在意义和重要性,而且位于今天人们的关切范围的前列。

他的文章至少以两种方式勇敢地逆流而上。其中多篇讨论的是一些有伟大创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是受到同代人和后来若干代学者的严重忽视,或是受到那些人自以为是的污蔑。对于这些被忽略和误解的思想家,至少因为他们敢于反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正统,就应当消除他们被人遗忘和轻视的状态,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这当然就是伯林的学术任务。例如,他论述维柯、赫斯和索雷尔的三篇文章,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就应被人们铭记。然而,这些文章极具创见,令人耳目一新,还因为它使我们感到一些新观念胚胎的逐渐诞生,以及现代世界的一些核心概念自十八世纪以来的浮现过程。在评价像维柯、哈曼、赫尔德、赫尔岑和索雷尔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和眼光不凡的人时,伯林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领悟力,能够感受到在一个时代的思想貌似合理的表面背后,人类精神的更深层的骚动和变化,以及晦

暗而不安的孕育期。那时存在着一些微弱但不时充满热忱的异见,它们受到当时人们的忽略、误解或嘲笑,但它们经常是以不连贯或表达不清楚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后来注定会变成遍及世界的运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起来反抗单一正统思想的各种不同的抗议运动,它们的一些最强大的理想,便是直接或间接地吸收自许多这类思想家的学说。伯林虽然十分清楚,这些不合常规的思想家——尤其是哈曼、赫尔德和索雷尔——的某些观点可以说极其愚蠢(他也确实这样认为),但是对于他们有可能而且确实也为我们提供的那些深刻而痛苦的见解,却绝对不可轻易放弃。伯林似乎认为,我们集体的发展每前进一步,我们都必须停下来,带着同情心倾听那些被歪曲了的异见者发出的呼声,或是对其进行批判,不管它们是深思熟虑之见还是粗陋不堪:忽视它们将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因为它们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样做将导致一个更丰富(而且可能更真实)的有关人是什么以及他能够是什么的认识。

因此,他的文章的许多主题,都涉及领悟到了某种观点的苦恼的人。这种观点是如此新颖而复杂,使他们没有能力做到充分理解和表述。他们本能地探索和理解这种观点,不十分明白自己正在做的、追求的或努力表达的是些什么思想。这不免令人想到,人类自觉的行动也许分为许多层次,一个有着创新性的知识眼光的人,他的某些观点,在他的生前,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别人,也许从未变得清晰可辨。这是因为,假如他留下了一些有关自己的所思所感的记录,他的追求——即他的基本的、逐渐演化的和仍然有待澄清的目的——的全部意义和影响,也许要在他去世数百年后,当对于他最早接触到的问题出现了精巧的语汇和适当的方法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方面典型而最突出的例子是维柯。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丰富启发的最伟

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开启了见识、感受力和理解力的新的、永恒的大门。

二

在伯林全部作品的中心,存在着一些历久不衰的哲学问题。自我的性质,意志,自由,人的同一性,人格和尊严;它们被滥用、侵害、侮辱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它们不受侵害的恰当边界(无论这些边界如何划定);认识不到这些事情的真相,尤其是对其加以歪曲,强迫它们同各种对其基本性质有太多否定的理论系统和模式相一致,由此可能或实际造成的后果;“内在的”人性和外在的物质自然之间的差别,基本范畴和适于研究它们的方法之间的差别——收在本书中的文章触及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扩展和深化了我们的理解。此外,对于哲学一元论的热烈争执,对于这样的教条——全部实在,我们关于它的所有知识的分支,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人类各种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或和谐性——他都通过细致地考察一些极力要摧毁它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学说,从许多角度做了讨论和批判。伯林专注于多元主义的出现,无论它是在伦理、政治和审美价值的领域,还是在人类知识的领域;在他论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的著作中,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但同样十分重要的认识论著作中,这种专注都居于中心位置,从伯林论观念史的文章所选择并讨论的每个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这个领域重要的发掘工作,使知识遗迹中的一些断壁残垣和怪异难解的材料得以重见天日;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它们便不时暗示出一种欧洲意识的现象学的若隐若显的轮廓,亦即新的转变性观点和一般世

界观,以及同它们相联系的概念和范畴,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在某些思想家和思想家群体中的出现;由此澄清了一些不但令作为学院中一名哲学家或专业学者,而且令作为一个人的他深感困惑的问题。

三

观念史是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在一个多半持敌视态度的世界里,它仍然有待人们的承认,尽管在英语世界也出现了一些人们内心逐渐发生变化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人们日益感到,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内容、他们观察自身和形成理想所依据的基本观念所进行的探索,在研究人这个问题上,可以比现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提供更多的启发;因为许多这样的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仅仅是一套专业术语和对经验及计量方法的运用。这些学科倾向于把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视为具有普遍性的 xvi 经验科学的客观对象,因而他们只是一些被遵守着统计学或因规律的力量所左右的消极而无感情的材料,因此这些学科倾向于排除或至少减少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们的规定性肯定是来自他们的内心生活、目标和理想,来自他们具有某种观点或观念,不管它多么晦暗不明,也不管他们是谁,他们身居何处,来自什么地方以及在做什么。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内心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动物和自然物体。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因此它极有可能对实践者提出比任何其他学科更为广阔而多样性的要求,或至少是一些更具体的、往往令人十分